

斯普朗格 (西元一八八二—一九六三)

鄭重信



斯普朗格 (註一) 是當代鼎鼎大名的德國哲學家、教育學家、與心理學家。他一生從事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不要說在德國，就是在希臘、意大利、英國、印度、日本、以及我國 (註二)，都遍佈他的學生。斯普朗格的重要著作，大部份都被譯成各國的語文。他的思想尤其影響了希臘、意大利、匈牙利、南美、日本等國家與阿拉伯地區。舉例來說。斯普朗格的學生們就給予希臘的國民教育很大的影響。根據斯普朗格有關師資訓練的建議，希臘設立了「教育學院」。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擔任雅典教育學院院長的巴勒奧洛格斯 (註三)，在他的任期中，又曾經根據斯普朗格的思想編授有關哲學、教育學、與心理學的講義。斯普朗格不但是傑出的思想家，也是德行高超的偉人；不但是舉世聞名的教育學者，也是名符其實的教育家。他的言論著作給二十世紀人類思想史展開了寶貴的、新的一頁。斯普朗格不愧為人師表，他的高尚品德令人萬分敬仰。

一八八二年斯普朗格生於柏林的郊區。他是獨生子，父親是個玩具商人，因此從小置身於各式各

樣的玩偶及玩具世界中，度過了相當富於幻想的童年生活。當時柏林的氣氛——那位威廉老皇帝、鐵血宰相俾斯麥（註四）、穿著花花綠綠的軍服作閱兵行進的部隊、興盛的藝術、以及老式的柏林市民等等——在斯普朗格的小心坎裏，自然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在十二歲的時候，他離開重視現代外國語文科的實科中學，轉入一個僧院附設的、重視古典語文的高級文科中學。青少年們有時難免輕狂；斯普朗格在鋼琴課方面稍有一點進步，而且剛開始學作曲，便立志要成為音樂家。但是，他終於放棄那種青少年常有的、一時的輕浮的志願，深下決心將來要學哲學。

一九〇〇年進入大學之後，斯普朗格受教於好幾位名師，其中包爾森（註五）給他奠定了良好的學術基礎，而生命哲學家狄爾泰（註六）的思想則引起了他的莫大的注意與興趣。當時的大學與現在的學程不大相同，在比較短暫的學程裏，大學生可以直接攻讀博士學位；在第三學期時，狄爾泰給了斯普朗格過份困難的學位論文題目，以致使只十九歲的斯普朗格由於用功過度，心身交瘁，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狄爾泰與斯普朗格的關係，便因這不愉快的事件的發生而中斷。加之，家道日衰大大地影響了斯普朗格的情緒。但他終於振作起來，改換了論文題目與指導教授。一九〇五年，在包爾森與史頓富（註七）的指導之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從一九〇六年起，斯普朗格一方面在一所私立女子學校兼課，以維持生活；另一方面開始撰寫學術論文，題目是「洪堡德（註八）與人道理念」，希望取得大學教員資格。由於所撰論文，得到狄爾泰與里爾（註九）的賞識，也促成了斯普朗格與狄爾泰的言歸於好，前嫌盡棄，重新建立起友好的關係。也由於這部著作的成功，斯普朗格才能夠認識里爾。一九〇九年夏天，斯普朗格走馬上任，當了

柏林大學的講師。

一九一一年萊比錫大學聘請斯普朗格擔任哲學與教育學的教授。他開了有關文化哲學，以及把重點放置在系統的、歷史的、與青年期心理學的教育課程。授課之餘，他埋頭研究人生的型式問題。一九二〇年春天，斯普朗格回到柏林大學繼任里爾教授的講席。一九二三年，他當了擁有大約七十位教授的大學哲學院的院長。一九二五年，他被選為普魯士科學院的院士。

在過去，「教育學」這一門科目，雖然在大學裏被講授，但並不是重要學科。回到柏林大學之後，斯普朗格就建立了教育學在學術界的地位。他使「教育學」在哲學院裏成為獨立的、比其他學科毫無遜色的講座。

在柏林大學教書的第一個階段，斯普朗格完成了轟動世界的兩部著作：「人生之型式」與「青年心理學」（註一〇）。在人生之型式一書中，斯普朗格從文化與人的關聯來了解作為全體的文化與作為其一肢體的個人。文化有國家、經濟、學術、藝術、宗教等領域的區分。人有追求各種價值的精神活動，由此相應地可將人分為理論型、經濟型、審美型、社會型、權力型與宗教型的人。但人與全體文化的關係，並不是完全相應的關係。因為一方面人的心靈只有與文化接觸且進入文化諸領域的過程中，才能發展，人不能完全由內部自行發展，另一方面，文化只有透過人的接受、參與與負荷，才能被維持、發展、與被創造。在青年心理學一書中，斯普朗格敘述具體的人的心靈如何發展。這本書與人生之型式一書可以相互補充。它告訴我們：青少年的進入精神的、文化的世界與他們心靈發展過程

交錯相連著。青少年的心靈發展不是自然科學的法則的生起現象，不是主要受生理或身體的影響或制約，而是與他們的一步步踏進知識的、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世界有內在的關聯。教育的功能在引導他們進入此精神、文化的世界，而使他們的心靈得到適當的發展。斯普朗格不僅關心人的教育問題，同時對文化的問題寄予很大的關懷。所以，他終生不斷研究文化的結構與各種重要問題，而除了教育問題之外，還發表不少有關文化的本質、生成、構造、危機、挽救等問題的著作。

話說回來，從一九三三年納粹黨獲得政權起：斯普朗格被捲入了激烈的公開論爭的旋渦裏。最後，因為不滿納粹黨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他毅然提出辭呈。他期望許多教授們會同時跟著引退。詎料事與願違，他的希望落空了！當時除了在學術院的刊物裏，他不能發表著作。一九三六年，斯普朗格受前德國駐日大使沙佛的推薦東來日本當交換教授，在日本各大學作巡迴學術演講，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次年，斯普朗格返回德國。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斯普朗格被徵召為軍中心理學家。一九四四年七月廿日，一些反納粹的份子暗殺希特拉失敗，因為斯普朗格與一些同謀者同屬於柏林星期三俱樂部的會員，他在同年九月因同謀的嫌疑而被捕入獄。斯普朗格被捕的消息傳出，當時在柏林的他的日籍學生們均大感震驚，並表示莫大的關懷。他們得到素來敬佩斯普朗格的日本駐德大使大島的支持與援助，在斯普朗格危如累卵的生死關頭，總算能夠使納粹政府釋放了他。從同年十一月起，斯普朗格開始在大學講授蘇格拉底（註一一）與柏拉圖（註一二）的思想。聯軍的空襲將柏林大學的教室一間間地炸毀了，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初，再也沒有教室可供教學之用；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他

才停止講課。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投降，俄軍進駐柏林。斯普朗格拒絕擔任科學院的總裁與柏林教育局長的職位。但因感到有義務協助重建他的老母校，他便義不容辭地擔當了柏林大學的校長。不久，英美法軍也進駐柏林。斯普朗格居住的達仁區成為美軍的佔領區。由於涉嫌與納粹黨狼狽為奸，斯普朗格再度被捕入獄，為美軍所監禁。因為他的確是無辜的，不久便獲釋出獄。但他的房子被美軍沒收。儘管發生了這種不愉快的事件，斯普朗格終於還是重建了柏林大學的行政組織。他很希望柏林大學能由四強共管，而不願依據俄式大學的榜樣來改造柏林大學。因為他的構想與俄國佔領軍事當局的想法格格不入，不到四個月，俄國人罷免了他的校長職位。雖然他仍為大學教授，但沒有開課的自由。以後的九個月間，西德各大學的聘書如雪片飛來，最後，他應聘於杜賓根大學。幸虧法國的佔領軍當局好意供應他車輛，使他能夠舉家遷移到德國南部。

在杜賓根大學，斯普朗格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二年退休為止，一直擔當哲學講座。但他開課到一九五四年。在這一段時期，他因深感德國的國民教育重建工作刻不容緩，致力於國民教育的研究與著作。他最關切的是國民學校的問題；所以，在此時期發表的很多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國民學校的固有精神」（一九五五年）與「生來的教育者」（一九五八年）兩本書。

斯普朗格不是只顧埋頭看書著書，明哲保身、不問世事的學者。只要有機會、有必要，他會毫無猶豫地獻身於實際的文化、社會、與教育工作。他終生都在注意教育從業人員作為國民應有的政治與

公共的義務。他不斷寫文章，作公開的建議，坦誠地陳述意見。斯普朗格認為人們如無義務感或責任感，文化將會死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斯普朗格早已指責德國知識分子缺乏責任感，而強調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自從一九三三年德國納粹黨掌握政權，斯普朗格看到了疏忽可以引起嚴重的後果。他的文化哲學越發傾向於成為一種文化病理學，特別著重探究文化的病態現象。他萬分關心人類是否還能控制現代的文化過程。他反對文化走上機械主義與野蠻的道路。斯普朗格認為：只有具備良心、有責任感、肯為大我盡力的個別的人所發揮的倫理力量，才能使文化走上正途。所以，他一再強調：新的文化責任與產自此文化責任的新教育為不可缺。

斯普朗格不但想到就說，同時也實踐力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斯普朗格熱心地參加全國教育會議，俾對國民學校教育的改進有所貢獻。他以開明的態度致力於教育制度的重建，大聲疾呼為新的師資訓練制度而奮鬥，嘗試改革大學教育，重視資賦優異學生的教育，並且幫助促進體育的發展。一九二六年，他與胡立德那、李德（註一三）等共同創辦教育刊物，經常發表文章，就各種教育理論與教育實際的問題，提出重要的見解。一九二七年起，斯普朗格開始著手整理出版裴斯塔洛齊（註一四）文集。在國難當頭之際，他總是當仁不讓地負起了重建工作的重任。第二次大戰結束時，斯普朗格覺得責無旁貸，挺身而出協助重建柏林大學的行政組織。在杜賓根的時期，他犧牲不少寶貴的時間與精神，為國家與社會而出力。

戰敗的德國，在各方面都面臨重重難題。斯普朗格又感到作為一個大學教授在學術之外應有的責

任。他認真地發表了許多以廣泛的大眾作為對象的言論文章。斯普朗格深切地希望教育可以促成顧到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的民主社會，實現充滿道德性與宗教性的人道主義的文化。所以，他不遺餘力地、有系統地發表演說與著作，以宣傳他的理想。斯普朗格也致力於有關國民教育與師資訓練的改革，以及創設新大學的顧問工作。他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止擔任德國研究協會的副總裁、聯邦內政部所設政黨法令籌備委員會委員、巴登維登堡州第九學年級教育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一九五一年從教職引退之後，斯普朗格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並且參加校外各種文化教育建設工作。

斯普朗格在德國文化教育界享有極大的名望。特別是中小學教師非常敬愛他。這種聲望，不是斯普朗格有意造成；而是無意的、自然產生的。斯普朗格從不趨附權勢，以求援引；也不到處拉關係出風頭；他很少利用廣播與報紙，以使自己出名，他也不喜歡別人的歌頌讚美。斯普朗格的早期與中期的著作都是專門性的，而不是針對著廣泛的社會階層。他的有關古典的教育學者如洪堡特、裴斯塔洛齊、福祿貝爾（註一五）等的研究論文，都是一種哲學史的分析，就是大學生也很難完全理解。要想了解他世界有名的著作人生之型式，則非具備高度的理論知識不可。他那同樣出名的青年心理學到現在為止，已經出版到第二十七版，其暢銷的情形可以想見，可是，其開頭第一章就討論很難懂的方法論，恐怕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了解。在晚期，也就是在他享盡了很高的榮譽時，斯普朗格才以深入淺出、通俗簡明的文字，為一般讀者寫作。那麼，斯普朗格的名氣從那兒來？這固然是由於他的學術思想以及對社會的貢獻，也是他的人格使然。

斯普朗格是很會教書的名教授，到萊比錫大學任教時，年紀還不到三十歲，但已成為大學內引人注意的焦點。他的課大受學生們的歡迎。每次開課，課堂裏聽課的學生，總是擁擠不堪。第一次大戰後，他在柏林大學接任當時在德國頗有聲譽的講座。果然不負眾望，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面，即在教學方面斯普朗格也有驚人的表現。他的教室總是座無虛席。各國的學生陸續慕名而來，擠進教室的窄門。在杜賓根大學時，雖然年事已高，仍然廣泛地受到學生們喜愛與崇拜。課堂上聽課的學生擠得水泄不通，連站著的地位都找不到。關於他上課的情形，有人作過詳細的敘述。斯普朗格的希臘學生巴勒奧洛格斯（註一六）說：「斯普朗格上課時，整個教室內「鴉雀無聲」，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聽講，講完之後，深受感動的學生們圍繞著他，跟著他離開教室。」施爾巴（註一七）——一九二〇年代在柏林念過書的女學生——也作了以下的報導：「斯普朗格在課堂上踱來踱去，用一隻手摸摸錶鍊或捻捻鬍鬚，優雅地用另一隻手翻翻講義。他在上課之前作充分的準備，上課時認真地教書，從不馬虎敷衍了事。他的講義章節分明，內容與結構完整而清楚。必要時，他能隨意而詳細地加以解說。斯普朗格從不鑽牛角尖。他的視野廣闊，他的學問深遠。他所開的課包括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格爾（註一八）、歷史哲學、教育史、裴斯塔洛齊、福祿貝爾與當代教育問題等等領域。這些課，無一不具有高度的水準。他不但傳授，並且啟發學生的知識。」二十五年後，這位女士訪問杜賓根大學時，看到斯普朗格正在講課，雖然錶鍊換成鋼鐵製的，鬍子也已不見了，但斯普朗格的講義仍如過去一樣完整而無隙可擊，講述清晰如故。

斯普朗格是個好學不倦、治學嚴正、不投機取巧、而「穩紮穩打」的學者。他不是屬於那種才華橫溢、心高氣傲的「天才」典型。雖然身體羸弱，過著嚴謹規律的生活，成為多產的學者，但也因此得享高年。他有高度的理智、清晰的思考力、以及處變不驚與頭腦冷靜的天性。在他的內心深處，一直隱藏著普魯士的那種獻身的、與履行義務的激情。這種激情就是他當仁不讓的個性與行為的動力。

斯普朗格不是在乎靜安樂中，一帆風順地渡過一生。在學生時代與早期的教書時期，因為用功過度，神經緊張而損害了身心。在萊比錫與柏林時期，他與對立者及極端分子爭論鬥爭，弄得焦頭爛額。他蒙受兩次坐牢的恥辱，體驗到其他無數的挫折與失望的痛苦；但他沒有心灰意懶、自暴自棄。他總是不屈不撓，保持正直的生活態度與倫理道德的情操，繼續努力奮鬥。

斯普朗格有銳利、發亮的眼睛。他的聲音很輕，但清楚而穩定。雖然乍聽之下似乎有點單調，但有令人舒適、使人引起信賴與新鮮的感覺。學生每有困難，他總是以開朗的態度，帶著和藹的微笑，說出充滿幽默與真理的話語，使學生精神煥然，決心振作起來解決問題。斯普朗格「誨人不倦」，他認真地、不敷衍地對待個別的學生。即使談話的次數不多，談話的時間短暫，但能給予學生豐富的啟示，建立了終生的師生關係。

如同在東方，有人具有浮淺的東方文化絕對至上的看法，在西歐也有人具有民族的偏見、驕傲、與優越感，或抱著傾向於歐洲中心的文化觀或世界觀。斯普朗格卻有促進國際了解的思想。他是一個

真正想了解外國文化的西方人。他強調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認為東方文化也有長處，而懇切期望東西方文化的接觸能加深西歐文化的合理性。斯普朗格喜歡外國學生，對他們愛護與關照無微不至。很多留德的外國學生，學業上受他的指導，品德上受他的薰陶。在一九二〇年代，在柏林有個留德的印度學生胡塞（註一九），患了重感冒與絕望的心病。一方面發高燒、身體虛弱，另一方面深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的個人與國家的前途暗澹，心灰意冷，不知如何是好。在此嚴重的狀態中，他收到了斯普朗格充滿著同情與人情味的一封信，信中他說：「對青年人來說，生病不是災禍，而是一種淨化。它會洗去多年來在身心聚集的毒素。病後，新鮮的血液會衝進血管裏來，可以使人精神煥發。」另一位學生胡生（註二〇）跟斯普朗格學過教育學與哲學。畢業考試日期迫近時，他的神經開始緊張，面露焦慮。斯普朗格非常關心他，勉勵他，並且告訴他如何準備教育學的考試。斯普朗格關切地問他是誰考他的副系哲學，看過那些哲學書，要不要作一番考試演習。斯普朗格開始與胡生作複習的問答，每當胡生答對時，他便和悅地笑笑，表示讚許。有時他以微笑來使胡生鼓起勇氣，答覆新的問題；有時他以笑容來代替對胡生的準備不足與無知所感到的驚訝。斯普朗格的和藹可親與樂於助人的態度，常使胡生銘心鏤骨，留下了終生磨滅不去的回憶與感激。

在斯普朗格的晚年，凡是看到過他，跟他談過話，以及有來往的人，都有口皆碑地說到斯普朗格開明的態度。他的注意與興趣不在於固執與確保過去自己既定的立場或觀點，而一心一意想要繼續研究問題。可能是年事已高的關係，斯普朗格變得安靜，沈默寡言，稍嫌呆板，而且似乎有點繁文縟禮

。但他總保持端正的儀容態度，注意禮貌，決不隨便。遇事總是首先想到別人，考慮如何幫助別人。一九六三年，斯普朗格夫人去世，使他悲痛萬分。他覺得生命疲乏，自己已不屬於此世，感到有過夠長的時間盡他的義務，現在可以死而無憾。同年，他也步他夫人之後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一歲。

附註：

- 一：斯普朗格 (Eduard Spranger 1882-1963)。德國哲學家、教育學家與心理學家。
- 二：就斯普朗格的中國學生而言，吳兆棠(已故，曾任國大代表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主任)，張天麟(著有中國母親底書，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四十一年十月正中書局臺一版)，王文俊(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與田培林(國大代表，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與教育研究所主任)等諸位先生，或上過他所開的課程，或曾受他熱心教誨，或承蒙他指導博士論文，都可算是他的門牆桃李。
- 三：巴勒奧洛格斯 (Georg N. Palaeologos)。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擔任希臘雅典教育學院院長。
- 四：俾斯麥 (Otta von Bismarck 1815-1898)。德國政治家。
- 五：包爾森 (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德國哲學家與教育學家。
- 六：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德國哲學家。
- 七：史頓富 (Carl Stumpf 1848-1936)。德國哲學家與心理學家。
- 八：洪堡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國政治家，哲學家與語言學家。是十八世紀時期人文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 九：里爾 (Alois Riehl 1844-1924)。德國哲學家。
- 一〇：人生之形式 Lebensformen 1921。

「人生之形式」，董兆孚譯，民國五六年，臺北商務印書館

青年心理學 *Psychologie des Jugendalters* 1924

「青年心理學」，王文俊譯，民國四十七年，臺灣省教育廳編審委員會印行

一一：蘇格拉底 (Socrates c. 470-399 B.C.) 古希臘的哲學家。

一二：柏拉圖 (Plato c. 427-347 B.C.)。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與他的學生阿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是古希臘最重要的兩大哲學家。

一三：胡立德那 (Wilhelm Flitner 1889-)。教育學家。李德 (Theodor Litt 1880-1962)。哲學家與教育學家。

斯普朗格與他們兩位同為狄爾泰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都被稱為文化教育學家。

一四：裴斯塔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教育學家與社會改革家。

一五：福祿貝爾 (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德國教育學家。

一六：同註三。

一七：施爾巴 (Kaete Silber)。英國艾丁堡大學教授。

一八：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國哲學家。

一九：胡塞 (Syed Abid Husain)。印度人。曾任新德里大學教授。

二〇：胡生 (Zakir Husain)。印度人。曾任新德里大學教授與印度共和國副總統。